

从希望到失望： 战地记者与国民党政权

——评柯博文著《中国的战地记者：抗日战争的遗产》

何铭生

(Peter Harmsen)

对中国抗日战争进行专业研究的英语著述不多,却在不断增加,柯博文(Parks M. Coble)所著《中国的战地记者:抗日战争的遗产》[*China's War Reporters: The Legacy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一书就是这样一本专著。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专业研究涉及中国的题目非常广泛,比如中国的战时外交^①、哈尔滨沦陷后的社会惨状^②、抗战末期美国对华政策^③、战时北京下层女性的生活^④和金壁辉传记。^⑤ 柯博文的研究对象是在中国和外国都令人感兴趣的题目:战时记者在社会中的角色。

该书资料丰富,在书中柯博文描述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记者是如何受1937年夏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影响,投身到各种新闻媒体,积极报道前线战况的。他特别关注那些和全国救国会有关联的作家,较详细地描述了那些对中国人来说很熟悉但在西方却很陌生的记者,比如范长江、金仲华和邹韬奋在战时和战后的职业生涯。

柯博文重点叙述了记者们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战争爆发时搁置意识形态差异的权宜合作与联合,到20世纪40年代初随着国共两党摩擦不断增加而出现的裂痕。他还描述了这些记者的战时经历是如何在1949年后的中国被湮没,改革开放后又随着公众对抗日战争兴趣重燃,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柯博文,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校区的历史学教授,此前曾出版过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

① Hans van de Ven et al. (eds.), *Negotiating China's Destiny in World War II*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② Kathryn Meyer, *Life and Death in the Garden: Sex, Drugs, Cops, and Robbers in Wartime 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4).

③ Richard Bernstein, *China 1945: Mao's Revolution and America's Fateful Choice* (New York NY: Knopf, 2014).

④ Zhao Ma, *Runaway Wives, Urban Crimes and Survival Tactics in Wartime Beijing, 1937 - 194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⑤ Phyllis Birnbaum, *Manchu Princess, Japanese Spy: The Story of Kawashima Yoshiko, the Cross-Dressing Spy Who Commanded Her Own Arm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和日本帝国主义^①,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政商关系的著作。^②他是研究中华民国中期历史最重要的西方学者之一,他的这部专著即是明证。全书将中国战时记者的工作与生活置于他们那个时代广阔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下。

战地记者:背景

有了战争与书写,就有了战地记者。从广义上说,古代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是一名战地记者,因为他的经典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就是记录他作为一名士兵亲眼看见的战斗。然而,从严格的现代意义上讲,战地记者在19世纪中叶随着大众识字率的提升和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等事件的发生才开始出现。

20世纪是战地记者的黄金时代^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达到顶峰。这一时期,交战国最好的记者全部被动员参与其中,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他们用自己的才华为国家服务。^④与此同时,作为文学流派的战地报道某些不确定的含义开始明晰起来,而它与历史学家的紧密关系则更引人关注。

显而易见,只有很小一部分的二战前线记者在战后成为小说家^⑤,更多的人投入研究他们曾在战场上经历过的战斗,以历史学家作为他们和平时期的职业。^⑥历史学家和战地记者的职业通常只有一线之隔,在二战中的某些情况下,二者似乎融为一体。马歇尔(S. L. A. Marshall),二战期间美国有名的战争史学家,他开创了战斗结束后即刻采访士兵的先例,有时会在战后几小时之内就采访他们。^⑦

西方记者也同样活跃在中国战场上。当英裔美国诗人奥登(W. H. Auden)在20世纪30年代末来中国报道战争时,他对他的朋友兼同事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宣称:“我们将会有一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战争。”^⑧事实并非如此。任何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不同于其他记者,他更多地使世界注意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的战斗。^⑨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外国记者也报道了这场战争,一些已经被完全遗忘。^⑩

① Parks M. Coble,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 - 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Series, 1991).

②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 - 1945*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and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 - 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Series, 1980).

③ 21世纪可能是第二个黄金时代,但判断新的通信手段技术和记者职业壁垒消除的影响还为时尚早。本质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名记者,但后果还是难以预料的。例如,人们可以认为在战场上写博客的士兵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战地记者。

④ 具体例子参见 *Report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NY: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95), vol. I - II.

⑤ 一个例子是德国战地记者洛塔尔·君特·布赫海姆(Lothar-Günther Buchheim),他的写作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海军,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他出版了在全世界畅销的关于德国潜艇战的小说,*Das Boot*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7)。

⑥ 例如,在战后的几年里,澳大利亚战地记者威尔莫特(Chester Wilmot)撰写了关于西部欧洲解放的经典著作之一,*The Struggle for Europe* (New York NY: Harper and Brothers, 1952)。

⑦ 马歇尔运用这种技巧的最早期的和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 *Island Victory: The Battle of Kwajalein Atoll*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1)。

⑧ 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1929 - 1939*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7), p. 289.

⑨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1937)。

⑩ 具体例子参见 Hallett Abend, *My Life in China, 1926 - 1941*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1943); Rhodes Farmer, *Shanghai Harvest: A Diary of Three Years in the China War* (London: Museum Press, 1945)。

以他们的报道质量来讲,本不应该如此。虽然大多数外国记者是用英文报道,但德语和法语记者也是一个为数不少、现在已很大程度上被遗忘的群体。^①

中国记者的作用

柯博文的著作集中描述了中国的战地记者在与日本战斗中的特殊工作环境,例如书中详细描写了1943年记者赵君豪和家人从上海到重庆的艰苦跋涉。对于那些对中国战争年代只有点滴了解的外国人来讲,了解到敌我区隔是多么松散,以及中国人迁移中可能需要穿越前线,这应该会非常令人讶异和吃惊。

书中提及最令人惊奇的事实之一是1937年中国记者所感受到的希望与1945年的失望并存。柯博文引用《大公报》的一篇社论来例证前者:“中国的儿女!我们应该庆幸,更应该骄傲,生长这个大时代里!我们祖宗所未见到的全国对外战争,我们见到了而且参加了,这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幸运!”^②

对于后者,柯博文摘录了曹聚仁描述的1945年的状况:“战争快要结束前的军事形势——我们可以用‘糟糕透顶’来形容。”用柯博文自己的理解来说,即“在军事上……胜利的前一年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刻”。^③

这种情绪——从战争开始的乐观反常地转变为战争胜利时挥之不去的悲观——和预期相反。毕竟中国从严重的民族危机走向了战胜国的位置。然而,从更深层来讲,它反映了包括许多左翼分子在内的中国记者和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1937年的中国已经显露出某种全社会的“国内和平”(Burgfrieden 或 Burgfriedenspolitik)^④,国民党政权与战前一直在争斗的各种力量,包括左翼作家,在战时也开始权宜合作。在危机重重的战争初期,当国民党政权正处于命运未定之时,这种合作尚可存在。而一旦蒋介石政府在紧张但仍可维持的情况下定都重庆,动员全社会甚至左翼力量的紧迫性明显下降,越来越多的战地记者被政权疏离,逃往香港、桂林等地。

记者不断增长的失望情绪的另一原因是,当从东部沿海的大城市被迫向西迁移时,他们目睹了乡村的真实情形。他们震惊于中国农民的麻木及其对国家困境的漠然。他们看到许多农民当日军飞机经过他们的田地,飞向城市里的轰炸目标时,他们甚至不抬一下头。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国民党在动员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这一关键任务是失败的。这与共产党在中国北方对农民的动员更为成功形成鲜明对比。

该书中最吸引人的部分之一是如何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报道。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了日军对中国平民所犯的暴行,其中空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正如柯博文所指出,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这种恐怖袭击方式前所未有,另外鉴于1937年春西班牙内战期间轰炸格尔尼卡后,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人

^① 具体例子参见 Wolf Schenke, *Reise and der Gelben Front* (Oldenburg: Gerhard Stalling, 1941); Robert Guillain, *Orient Extreme: Une vie enAsie* (Paris: Arlea/Seuil, 1986)。

^② Coble, p. 24.

^③ Coble, p. 116.

^④ “国内和平”(Burgfrieden 或 Burgfriedenspolitik), 或称为“城堡休战”(castle truce), 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政治对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共同对外敌而暂时搁置分歧的合作, 与中国的统一战线策略有着有趣的相似性。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 这几乎是战争时期的普遍现象, 此时甚至生死斗争都可以被搁置, 直到外部威胁消除。一个例子是无神论的苏联官方在遭受纳粹袭击之后, 决定重振东正教以便利用公众蛰伏的宗教情感。

口密集区所遭受的空袭,这种报道更可能引起外国读者同情。

另一方面,关于日军地面暴行的报道要少得多,特别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就很少。对此,柯博文解释说,就实际情况来讲,记者更容易报道空袭受害者,因为他们一般是在非敌占区,而惨遭日本陆军暴行的百姓通常是在敌占区,所以记者很难去报道。^①

柯博文通过追踪战地记者在战后的职业生涯,说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依旧在新闻界发挥重要作用。他也指出,直到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记者的战时经验几乎被遗忘了近30年,随着公众对这场战争的兴趣不断增加,他们的战时报道再次被注目,有些被再版重印,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那段历史。

本书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基本情况,在部分章节里,例如在描写战争初期的空袭和中国旅行社^②的作用时,作者花了大量笔墨来叙述战地记者当时的工作背景,也许这些信息更应放在脚注里。当然,对于那些对中日战争所知甚少的学生来说,这本书也是轻松易读的。

讨 论

本书尝试展现中国战地记者及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工作这个宏大的主题,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它指出了研究方向,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相关研究成果出现,这个方向可以概括为三个广义的领域:文学价值、比较研究和接受史。

文学价值: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对中国记者的报道给予明确评价将会十分有趣。显而易见,他们的报道首先是为国家大义,而报道本身的文学性也必不可少。即使如此,更多地去了解这样的环境下能否产生高质量的新闻报道还是有用的。我们知道一些美国战地记者,如恩尼·派尔(Ernie Pyle)^③,他撰写的报道在今天仍受人欢迎。那么,西方读者也会对中国记者的报道感兴趣。

柯博文列举了大量中国记者的战时报道,但绝大多数是公告和讲话。例如,台儿庄大捷后范长江写道:“这一战争的重大意义,不只在消耗了敌人几万炮弹,不只在消灭了敌人近万的战斗员,不只在打毁了敌人十几辆坦克车,不只在粉碎了敌人打通津浦路的企图,不只在打败了矾谷、板垣,而在建立一种新的胜利信念。”^④

将来,西方读者,特别是那些不懂中文或不能自己查考中文资料的读者,会对有关中国战时记者的著作感兴趣,他们会明白与其说诸如范长江这样的战地记者是宣传家,不如说他们是作家。越来越多的例证表明,他们亲临前线,报道台儿庄之战,可以帮助读者明白为什么他们能在同辈人中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被认为是那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人。

比较研究:更多的比较研究可能会非常有趣。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记者也不是完全自由地去报道他们所目睹的事情。处于相对自由的报道(美国)和完全受管制的报道(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的是中国的战地记者吗?对于这个问题,站在中国立场的记者和站在日本立场的记者,他们的社会角色和作用又怎样来比较呢?

^① 提到对敌人暴行的报道时,恐怖与希望总是一线之隔。1944年10月苏联士兵占领德国东部城镇内梅尔斯多夫(Nemmersdorf),对平民实行了大量暴行。纳粹宣传机构大肆报道了这一事件以增强德国士兵的战斗士气。然而,效果和预期相反,反而引发了德国民众从可能很快被苏联占领的德国东部地区大批撤离。参见 Wolfgang W. E. Samuel, *The War of Our Childhood: Memories of World War II* (Jackson MS: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2), p. 210。

^② Coble, pp. 63-66, 92-93.

^③ Ernie Pyle, *Brave Men*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1)。

^④ Coble, p. 51.

比较研究法也可以从时间的比较扩展到程度的比较,考察全面战争爆发给记者带来的各种压力,和被迫改变的程度。记者不可避免地首先被要求充当战时动员人民的工具,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坚持个人的“声音”?多少和平时期的艺术成了战时非常时期的牺牲品?

接受史:不同的接受史可能是继柯博文著作之后令人期待的研究题目。特别是对记者来说,动员那些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庞大群体,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引出了一个记者自身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有着庞大文盲人口的国度里,他们的报道如何传播?知识分子是否会给文盲读他们的报道?在口耳相传中他们的报道是否还有生命力?

事实可能是,新闻报道的绝大多数读者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中青年。那么,记者的报道在动员市民加入全面抗战中有多重要呢?与电影、小说等其他传播方式相比,记者报道的效果又如何呢?诸如此类的研究可能会面临重重方法论的困难,但它们不是不能克服的。比如口述史可能就是衡量战地记者对周围社会产生影响的一个方法。

结 论

本书是有关中国战地记者的扎实的学术著作,它展示了他们从1937年到1945年的轨迹,说明他们如何充满激情地投身于动员民众的任务中,以及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左倾观念与国民党政权之间是一道鸿沟时是多么失望。一些人选择了远离政权,一些人几近被流放,去了香港、桂林或延安。

柯博文在书中也呈现了记者的战时报道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所经历的“复兴”。在“战争年代”热潮中,相关的书籍和其他传媒产品席卷中国市场,本书为这股热潮增添了一种真实的声音。

柯博文著作的一大优点就是关注社会背景,书中描述了中国记者在抗日战争的广阔史诗画卷背景下,所经历的每一步。这意味着,对二战中的中国战场所知甚少的学生来说,《中国的战地记者》既是他们的学习材料,同时也可以作为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导读。

[作者何铭生,丹麦奥胡斯大学社会科学院公关部专员;译者郭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士华)